
邵丽作品论

十

杨 莉

一、女性生命的关照

在邵丽早期的创作中，对于女性生命的观照是一个重要主题，这方面作品主要有《故园中的现代女人》、《礼拜六的快行列车》、《碎花地毯》、《玉株》、《寂寞的汤丹》、《迷离》、《明惠的圣诞》等。这些小说以女性的情感生活为切入点，以此进入女性命运的思考。故事都是以当下生活为背景，切近现实生活，写生活在欲望化时代的女性的情感轨迹以及由此辐射出的女性的复杂真实的生存境遇问题。《故园中的现代女人》写一个因爱受伤的女人在青草蔓延的地坛公园里穿梭徘徊，静静舔舐自己的伤口。又因故园的荒芜与宁静而有机会在喧闹的都市中的一个寂静的角落里慢慢沉下心来，陷入对生命的冥思之中。“故园”与“现代”是一组对比意味鲜明的词汇，富有隐喻性质，隐喻传统与现代在知识女性身上形成的矛盾与统一。两个知识女性都是现代化都市里成长起来的现代女性，潜意识深处却充满了传统思想。都有一个深爱的对象，当对象在有意或无意做出了背叛自己的事情时，虽然

目睹身边无数人身上发生着同样的时代之病，二人骨子里却无法接受这样的实事，但又固守“家”的观念难于果断地挥刀斩断一切，于是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纠结之中，徘徊在爱情、家庭、现实之间难以做出选择。作品形象揭示了深受传统熏陶，又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面对价值观念正发生裂变的时代的无所适从。《礼拜六的快行列车》讲述一位大龄女博士遭遇“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感情的无奈与被动顺应。那位男博士不停地表白爱他，似乎是要坚定她的信念更应该说是坚定他自己的信念，但他的衣领上有时会有一些洗不掉的口红痕迹，他的单身宿舍洗脸池上有时会无意中发现一些长头发。“但我什么也不会说，我时刻牢记着我的身份，同时也记着他的。”女博士还是习惯性地一如继往地往地乘坐星期六的快行列车往北京赶去，如那趟快捷、惯性而又机械的快行列车一样，“快行列车”也是一个隐喻，象征机械而有巨大惯性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生活。写出了现代知识女性面对欲望化时代、性别身份的无奈心境。作者由女性情感切入时代肌肤，细细打量来往其中的女性，她发现的是日

常生活覆盖下常人难以发现的隐秘经验，是淹没在时代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视的女性生命存在，因此，作品是深刻的。

来自女性生命深处的欲望角度探讨女性本然的欲望与浪漫情感追求、与女性生命光彩的抑制与张扬问题是邵丽的一个独特发现。《玉株》中，酒店经理玉株是一个话语不多，但办事利索有分寸的漂亮女子，她对每位男士都是礼貌周到但保持距离，大家反而因都得不到而心理平衡，又由于她的乖巧而招得大家的爱护。玉株已是人到中年，自觉不适合在酒店继续工作，想到酒店所属的盐业局上班。玉株去找局长项阳谈工作的事，在玉株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二人发生了关系。但整个过程玉株是泰然而且迎合的，事后她有一丝的慌乱，但她很快就想清楚了，她是爱项阳的，“她的体内蕴藏着一种不自知的邪恶的东西，她渴望有一次突破。”玉株曾经平淡地走向婚姻，多年了，她内心深处是不安于平淡的，她的内心渴望“突破”，但在日常生活中，在“淑女”这层外壳的包裹之下，这种“突破”难以实现，但这种渴望随时都在寻找机会破茧而出。“突破”行为和现实伦理是相悖的，但作者恰恰给出一个机会让这些女性挣脱世俗伦理的羁绊，由此透视她们自己生命深处的那种本然渴求。《寂寞的汤丹》中，汤丹在一次开会时遇上宣传部长李逸飞，李逸飞是那种让汤丹心仪的男性，“她深陷在某一种难以自拔的激情里，莫名的兴奋又夹杂着一点隐约的痛苦。”在女性的矜持与内心深处欲望的交织之中，她十分甜蜜而又痛苦万分。邵丽笔下的这些女性都不是坏人，大多美丽而可人，甚至大多思想上还有点传统、平时循规蹈矩。但她们宁静而美丽的外表之下有一颗躁动的心，这心里面住着一个“魔”，平时被囚禁在最深处，一旦遇到激发的元素，便像打开瓶盖的魔瓶，现出张

牙舞爪的身形。邵丽在描写这些情感的时候，并没有采用越规的笔致，也没有谴责的姿态，而是把这种情感描写得很自然、很美丽，她笔下的女性正是由于这种情感的长期压抑而无法得到释放使女性的生命呈现出枯萎的倾向。一旦得到释放，女性反而获得了一种别样的滋润，生命再度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但另一方面，邵丽也发现了这种放“魔”出瓶的行为的危险性与悲剧性。这种被女性视为诗意浪漫的情感，往往会被现实中的男性以欲望的方式消化掉，从而把女性浪漫想象一下子撕得粉碎，陷入尴尬、失望甚至绝望之中。《玉株》中的玉株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会事，和自己想象的太不一样了。当她满怀情爱与虚幻想象的时候，项阳并没有把她当作一回事，她再次满怀希望去找项阳，等待几个小时后，结果是从项阳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另一个女性。《寂寞的汤丹》中的汤丹最后看到的是李逸飞的冷淡与自己丈夫的出轨。

邵丽对于女性的深层心理揭示是令人吃惊的，她试图挖掘日常生活背后最深沉的、最隐秘的东西，也包括了在现代商业社会里女性命运的反思。此外，这些小说中反映出的现代社会情感的游离是商业化的社会在人的情爱方面的投射，因此具有社会学意义。真正敬畏生命的叙事者，决不会向现实低头，而是坚持从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与体验出发，去观察思考现实、描绘现实，既不去人为地烈化现实，也不会人为地虚饰人类的真实生存状况，而是直面生命的美与丑、苦或乐。

二、寻觅生命的尊严

如果说探索女性隐秘的情感区域，女性在现代商业社会里的情感境况是邵丽小说生命意识的辅助面的话，那么，呼唤人道主义，寻觅人类内在的

生命尊严是邵丽生命意识的主导面。邵丽小说中写了不少底层的小人物，关注他们在历史、命运巨轮的碾压下，他们生之追求、生之顽强、生之尊严。《明惠的圣诞》叙述乡下女子明惠高考失败，进行谋求新生活，最终命丧城市的故事。明惠的悲剧正是尊严丧失的悲剧，明惠当初进城的目的就是过一种让人看得起的生活，她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满是泥巴、落后思想的乡村了。李羊群虽然满足了物质生活上的需求，但在精神上却忽略了她，甚至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在圣诞节那天李羊群把她带了出去参加一个同事聚会，当李羊群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同事时用了“伙伴”一词，明惠知道“伙伴”一词可能是工作伙伴，也可能是生意伙伴，或者是性伙伴。在那群人热热闹闹把她忘在一边的时候，她独自走了，第二天李羊群回到家发现她躺在床上，但身体已经冰凉。她爱上了李羊群并打算嫁给他，当她发现她在那个与自己同居两年多的李羊群的眼里仅仅是“伙伴”时，加之那群人的漂亮与霸道及对她的不屑，她绝望了，以死来维护了自己尊严。这个故事被放置在了城乡文化差异的背景之下，也被置入了时代内核，作者思考了生命尊严被如何被时代所左右的问题。城市化进程给农村带来了冲击，也带来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土崩瓦解，笑贫不笑娼已成常规。村民对于没有考上大学的明惠采取的嘲笑，而对在城里做按摩女挣钱回来衣着光鲜的桃子却是艳羡。明惠在心理的落差中怀着向往与期待走向了城市，但在城市找到的是物质上的满足与生命尊严的丧失。李羊群及其同事对明惠的俯视与漠视使明惠自觉尊严丧失，最终导致了她的随绝望而逝。

人道、正义等崇高范畴始终与生命感知、生存意识紧密相联的，关注底层生命的尊严，平等对待每一个生命个体，是邵丽作品中蕴含的人道

情怀。《刘万福案件》中写每到春节的时候，领导都会去慰问一些贫穷的家庭。这种慰问多数带了记者，还有不少被慰问的困难家庭被请到了屏幕前面。于是，那个小女孩愤怒了，她喊道：“为什么只有到了春节才能看到你们的笑脸，摸到你们温暖的手？……你们从来没有想过，把我们一家人的痛苦拿去展览我们会是什么心情，我爸爸每年都要在电视上死一次，我妈妈每年都要在电视上跑一次。”他们是存在生活底层的弱势生命，也是独立自由的个体，简单地把廉价的同情强加在弱者的身上并自以为是一种恩赐，恰恰是忽视了平等个体的生命尊严的行为。一个生命个体，和其他生命形式有共同的道德准则：维护个体健康、自由、美好的存在，为自身健康、自由、美好的生命而存在。当那个贫穷的小女孩站出来拒绝接受帮助拒绝上电视的时候，是基于个体生命道德而进行的抗议。春节探望困难家庭本来表达是对于弱势生命的怜悯，一旦搬上屏幕作为宣传手段时便有了做秀的意味。不是出于平等生命本身之间的理解与尊重，只能造成对于另些个生命的伤害。作者提醒我们：置身现代化媒体中的人们在貌似善意关怀背后，还应该考虑生命的尊严问题。

当然，邵丽对于底层生命不仅仅是理解与同情，她也在竭力发掘他们的抗争精神。《刘万福发案件》中的刘万福所在的村庄里地痞流氓横行，甚至与当地执法人员勾结欺压百姓，刘万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拿起刀砍了那个流氓。刘万福的行为构成了一种犯罪，但刘万福出事之后却得到了广大乡亲的维护，他们挺身而出呼吁政府从轻处理刘万福。刘万福手刃流氓，维护的是广大村民的生命尊严。地痞流氓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是对广大村民尊严的践踏。因而，刘万福杀人不合现代化法律，却符合日常生活伦理，因此得到

众乡亲的支持。《明惠的圣诞》中的明惠正是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满足，她以死表达了对于尊严的维护。邵丽告诉读者：每个生命都有尊严地存在着理由与心愿，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者，还是处江湖之远者，无论社会向何处发展，每个生命个体都受到公正平等的对待才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标志。乡村现代化也是如此，如果农民尊严的丧失是乡村现代化的代价之一的話，那这样结果是值得令人深刻警醒的。因此，作者不仅仅对生存本真进行了展示，而且在对人们生存面貌的描绘中蕴藏了对人与历史的关系、人类自由、人类文明的深度反思。

三、窥探生命的丰富与疼痛

探索生命的轻与重，发现生的丰富与丰富的痛苦是邵丽生命感悟的核心意旨，也是其创作成熟的标志。新作《我的生存质量》对于生命丰富性的探索更进了一步。通过对两个家族几代人命运的打量，力图复原已经逝去或正将逝去的人生，让我们看到几代人在几个时代富有质感的生活，里面渗透了作者点点滴滴的生命感悟，作者穿过岁月的风尘，竭力去寻找一些生命中的永恒，寻找人类存在的真正意义。从父辈对于“革命”的忠贞和家庭的责任，到“我”辈不顾一切对于“爱情”与“诗”的执着追寻，再到下一代的一切“无所谓”、一切“理所当然”的随意态度，作者展现了多样的生命内涵。父辈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挥洒激情，流血流汗，把挂满弹片的生命诠释得流光溢彩，“革命”与“奉献”在他们的生命里是最神圣的字眼与永远的信仰。另一方面，个体生命也被淹没集体生命之中形成千人一面的现象，“每隔一个月最多一个季度，就把自己的生活、工作、思想向组织汇报一次。其实除了日常

生活，连婚姻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我的生存质量》）到了文革时代，这种神圣却抵挡不住一个小小纸片的侵扰，一张划破了的主席像足以让生命陷入极端危险与深度恐慌的无序之中。“我”辈已经摆脱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梦魇，来到了一处挥洒生命自由与爱情的时代，苏金朋与金地不顾一切地走向了爱情，但金地一次无意中听到苏金朋在电话中非同一般的低语，一下子发现原来自己一向笃定的情感并不是密不透风。有了外遇的苏金朋平时却又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称职的丈夫、伟大的父亲，至此，生命便现出了复杂意味。“我”的女儿从小生活优裕的生活里、繁重的作业里、苦练的琴声里，长大又生活在解构崇高、个人至上的年代里。正是在这无量数时间的延续与无量数空间的延展中，交叉错综，组成了生命的合唱。生命追求的征途上存在各种各样的风景，阳光、风暴、甚至残酷。在穿越历史、回眸家族各个生命的历程中，作者既窥见了生命的高贵与不朽，也看到了其中的某些卑劣，既看到生命的热力与伟大，也见证了它的脆弱与无奈，这正是气象万千的生命万相。

这部作品有极鲜明的自传色彩，可以说是现实中的邵丽的生命经历的投射。

和书中的女主人公一样经历了巨大家庭变故的邵丽把心拿出来放在痛苦的汁液中反复浸泡，在痛苦的炼狱里经受了多番的煎熬，最终她抵达了生命的本质，写出了沉甸甸的文字。小说中的“我”一直有着自己固定的生活节奏与生活内容，有相伴的爱人，优越的生活，小有成就的人生，她的生命是轻快的。突然一天她从生活链条上掉了下来，种种压力接踵而至，她的生命变沉重了。生命总中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偶然因素随时会出现在生命里左右甚至改变生命的轨迹。邵丽写到：“所谓命运，无非是这样一种东西：

除了死亡和结果是你预知的，其它的一切，在没发生之前，你都无法知晓，甚至一点先兆和口信都没有，但又必须硬着头皮去经历它。”（《我的生存质量》）经过不幸的邵丽对生命与存在有了新的领悟。“我的生存质量”中的“生存”既指人现实生活处境，也指当下时空中人的本真处境。有人指出：“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物，存在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能够成为的一切，他有能力做出的一切的领域。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来绘制存在的版图。”^①邵丽绘制的存在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她经过反复思考，得出结论，存在不是欲望、不是虚无、不是颓唐，而是正确地存在，有理性有道德地存在，这是存在的基本维度，也是人与其它动物的存在的根本区别。一旦对这一点领悟之后，她释然了，丈夫出事后经历的种种人情冷暖、社会现实中种种难以遏制的欲望、父辈们迥异于现代的思想观念等等都是特定时代的存在，于是，她发现“经历了这么多，还有什么疙瘩没解开呢？如果你觉得生命是值得珍惜的话，那你至少应该懂得，你的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正好——”她由激愤变得平静，由焦灼不安变得淡定，由迷茫不安变得通达从容。

真正伟大的作家，不会回避严峻的现实问题，他们往往以一种执拗的力量要撕破黑暗指向光明，以叙事的方式向世界发出心灵的呼唤。《我

的生存质量》在家族几代人的不同命运中作者更多地融入了人类当下精神境遇的洞察与表现。

“我”的父辈曾经为一个新生的中国而流血牺牲再所不惜，却无法承受一张破报纸上被画破的领袖像带来的厄运；“我”辈所孜孜以求的爱情与家庭难敌商业时代黑手的侵蚀；后现代的“女儿”竟然视她们视为神圣的救助活动为“自鸣得意的意淫”。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精神，小说家的使命在于透过生活表层去发现这种精神，并思考这种精神存在的困境及其可能的出路问题。传统道德的溃散、欲望的膨胀、理性的失败等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精神特征。我们从书中个人命运的变动中可以感受到历史潮流的涌动。

正是对生命的追问与最终的超越及这一行为所表征的存在勇气，《我的生存质量》对生命的叩问带给我们阅读的感动。本书的意义还在于它表明邵丽思想由外向内的转向，由生活的临摹书写到对生命存在本体意义的探询，是一种深度的主题话语转向。在对家族历史脉络的梳理、几代家族成员命运的探询中融入自我生命价值的叩问，因而这次写作成为其反抗沉沦、自我救赎的一个仪式，是创作主体生命存在与超越一个确证，因此，可以说书中隐藏的正是作者窥探到的生命存在密码。

杨莉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注释：

①艾晓明编译：《小说的智慧——认识米兰·昆德拉》，时代文艺出版，1992年，第41页。